

艺术也娱乐

Art and also Kind of Entertainment

编者按 Editor's Note

近年来，无论是在文化还是艺术领域，各种各样的选秀、评奖、榜单……不绝于耳。

一方面，就大众文化而言，这样的活动提供了一种所谓的“平民梦想”，它让“人人都可能一分钟成名”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另一方面，就当代艺术而言，艺术也在此过程中变得更加娱乐化、大众化和时尚化。

不可否认，国际上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艺术大奖，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成为当代艺术发展的风向标，也成为艺术史的有力见证。而国内近期的各类艺术评选和排行榜，也很大程度上活跃了当代艺术的氛围，提供了新鲜的动力。与此同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艺术的发展轨迹不同以往，与时尚和娱乐结盟似乎成为当代艺术走向大众的有效渠道。

但是，一些随之而来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例如，在各类奖项和排行的背后，是否存在利益驱动下的商业炒作？各类艺术评选和排行的学术性依据在哪里？它的公平、公正性如何保证？而它的社会影响力如何得以实现？我们的艺术、文化，甚至一切在当下是否都可以拿数据来量化？同时，艺术和时尚的关系何为？在娱乐泛化的时代，艺术需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吗……

《当代美术家》本期的话题将就这些现象展开讨论——也许，艺术圈将来有一天也会有自己的“超男”和“快女”；也许，艺术品将来有一天也可以像LV那样为市井大众竞相追逐……但是，在此之前，还是让我们回到艺术本身，看看一系列秀场、榜单和时尚烟雾背后的真实。

艺术评选，谁执牛耳

Who to Choose The Awards

刘晓琳 孙凤 Liu Xiaolin Sun Feng

而在视觉艺术领域，评判标准的多元化与艺术周期的不确定性使得相关的评选模式更为复杂化和特殊化，尽管这些活动在艺术机制中应运而生，有迹可循。

在中国当代艺术机制中，艺术家、批评家、美术馆、画廊、拍卖市场、艺术博览会、赞助人、艺术媒体等诸方面日渐成熟，在各自的运营模式中逐步积累了经验价值，并形成有效循环，而此种循环在时间、空间上纵横交错、各行其道。基于此，艺术奖项评选活动为艺术机制的各个层面提供了交汇的平台，将某一特定时期（比如一个自然年）内的艺术事件、艺术人物、艺术机构放到同一个平台上进行评价，实现相互间的激励、认可与融合。在星光熠熠的颁奖时刻，所有被纳入其中的成员都将感受到——世界是平的，艺术世界是开放的，活力四射的。

作为国际艺术领域的权威奖项，电影界的奥斯卡，戏剧界的托尼奖，音乐界的格莱美，文学界的普利策，无一不把握着时代的脉动，记录着文化的潮涌。而在视觉艺术领域，评判标准的多元化与艺术周期的不确定性使得相关的评选模式更为复杂化和特殊化，尽管这些活动在艺术机制中应运而生，有迹可循。

评选之路：千门次第开

进入现代商业社会的评选，最成功者当属《福布斯（Forbes）》推出的“富豪排行榜”，作为全球著名的出版及媒体集团，福布斯集团首开美国商业新闻的先河，其旗舰刊物《福布斯》杂志，是美国最早的大型商业杂志，被誉为“美国经济的晴雨表”。由福布斯集团创制的“富豪排行榜”每年都能吸引全球的目光，其榜单反映了产业的变迁和个人的兴衰起伏。可以说《福布斯》是世界经济的一个缩影。正是由于《福布斯》总是以敏锐的眼光对社会经济做出的准确判断，平台的社会影响力决定了其榜单的市场影响力。



撞墙 装置 蔡国强



草船借箭 装置 蔡国强

作为富豪排行榜框架下的艺术排行榜，胡润艺术榜 (Hurun Art List) 则对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进行了大量信息收集和研究，对艺术市场的领军人物给予高度关注。出于商业需求，这些排行榜在内容甄选上强调明星效应，彰显成功元素，从而有别于以支持、发展有潜力的艺术人才以及肯定艺术探索成就为目的的艺术评选形式。

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展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界级别最高、评选最复杂、宣传最广泛，并发挥了重要历史意义的评选活动。“全国美展”是由中国文化部和中國美协联合主办的国家大型美术展览，是国家文化管理部门对全国范围内美术创作进行的定期质量检查、成果展示和价值评定，通过对送展作品的取舍和授奖，来体现国家的文化主张和方针政策，反映国家提倡的“主旋律”与“多样化”，具有最高的行政权威。同时，全国美展组织顶尖级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组成评委会，对参展作品的艺术形式、表现方法等具体问题做出严格评审，具有最高的学术权威。

从1949年至今，全国美展已有近60年的历史。其展出的作品可谓是各个时期中国美术格局分布、活动动态、艺术水准及发展走向的总结，展示了新中国各个阶段的最高艺术成就。在半个多世纪的持续运行中，全国打造出一大批美术精品，尤其在缺乏有效传播和自我展示机会的历史时期，参加全国美展几乎是“华山一条路”，是艺术家唯一可以与外界交流、为外界所知的机会。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和作品通过全国美展脱颖而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艺术本身的发展，全国美展已不再是年轻艺术家的必需选择，全国美展的代表性在多元时代越来越缩减，逐渐失去了它无所不包的特性，其运作方式和展出结构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思索。

1997年，以收藏大量中国当代艺术品著称的前任瑞士驻华大使乌利·希克 (Uli Sigg) 在瑞士创立“中国当代艺术奖 (CCAA)”，为中国艺术奖项评选模式引入国际视野。该奖项旨在提升中国当代艺术的国内、国际地位，为中国当代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国际化的展示平台，也使国际策展人关注并见证了中国当代杰出艺术家的成果。在十年来的中国艺术机制发展中，面对市场对于艺术不容小觑的支配力，奖项设立者乌利·希克认为“为了平衡两者的关系，并丰富这一论题的讨论，CCAA这样的组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少国际性大型展览也设置艺术奖项，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艺术动态。在近日的佛罗伦萨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中，中国艺术家舒勇获



背后的故事 装置 徐冰

得2009年佛罗伦萨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终身成就奖，再次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化在世界格局中的重要性。

立足当下，植根本土，能够全面深入体现中国当代艺术独立探索精神与艺术界的社会责任感的评选活动当属雅昌艺术网主办的“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 (AAC)”评选。自2006年设立以来，历经三届，凭借其扎实的运作模式与服务艺术的理念，“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评选活动在其规模、组织结构、业内号召力方面逐届递加，对艺术现状与前景做出了积极的影响与推动。其评选委员会充分吸纳各个领域的代表性专家，评选内容涵盖重要艺术家、展览、青年艺术家、画廊、出版物等，使此项评选活动实现了跨越领域的合作，进而最大化地实施艺术的社会影响力。至此，艺术评选活动在对艺术机制及资源的整合中开始形成强劲势头，不仅仅成为艺术圈内部的风向标，也将社会资源与公众关注力吸纳进来。

学术至上：权威的制衡

艺术评选活动的生存力来自于它与整个艺术机制的相互作用，有效的运作模式是其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艺术评选的权威性无疑是运作模式中的核心竞争力。

拥有25年历史的英国艺术奖项——特纳奖 (Turner Prize)，尽管因其惊世骇俗的评奖结果而时常遭受“声名狼藉”的质疑 (infamous Turner Prize)，其评选过程却向来不容草率。这个以英国绘画大师威廉·特纳命名，为推动英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和表彰当代英国艺术的突出贡献者而设立的奖项，其评委会由“新艺术赞助人 (Patrons of New Art)”和泰特美术馆协商确定，通常是由一位英国展览策划人，一位英国艺评家，一位海外策划人，以及“新艺术赞助人”代表和泰特美术馆馆长组成，泰特美术馆馆长任评委会主席。候选人提名于每年4月到5月底由公众提名，再由评审委员在第一批候选人名单中确定提名，也可以增加提名。评委会选定四位候选人，参加历年岁末在泰特美术馆举行的特纳大奖候选人作品展。展览期间，评委会要举行例会，选出本年度特纳大奖的最终获得者，以能够更全面地反映英国当代艺术的状况。特纳奖每年授予一名50岁以下的英国艺术家或旅居英国的艺术家。获大奖者将得到2.5万英镑奖金，其他3位入围者各得5000英镑。此种评选模式基于其学术与体制的权威性而得到认可，而来自不同领域和背景的专家在投票权的制衡中顺理成章地达成自身对奖



恐龙 装置 徐震

项应有的评价贡献。

前文提到的“中国当代艺术奖 (CCAA)”同样拥有豪华的评委阵容，历届评委包括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卡塞尔文献展策展人Ruack Noack、德国艺术之家美术馆馆长Chris Dercon、艺术家艾未未、美国旧金山艺术学院展览策划与公共项目系主任侯瀚如、策展人及评论家顾振清、策展人及评论家黄笃和希克本人等。

“艺术中国 (AAC)”活动的评委阵容所涵盖的领域则更为广阔：评委组成充分吸纳包括宏观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美术史、策展人、批评家、艺术市场专家在内更广泛的各个领域的代表性专家，设轮值主席评委一人，每年在主任评委中通过推举的方式产生；评委的宗旨是对中国艺术领域的发展进行年度性的总结，代表学术界最权威一致的观点，并公平、公正、公开的对每年在中国艺术发展中尤其是学术建树方面有重大成就和贡献的艺术家、艺术机构和艺术活动做出评价，进而推动中国艺术在更广泛领域的发展。第三届评选活动的轮值主席评委为高名璐，评委有陈

默、龚继遂、贾方舟、李建国、鲁虹、梅建平、水天中、孙振华、巫鸿、殷双喜、余丁、俞可、张晴、张颐武、张子康、赵力、朱其等，评委的学术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为评选活动搭建了平衡稳固的框架。

财富效应：牵一发而动全身

奖项评选背后的资金支持者拥有怎样的话语权？商业模式与非营利模式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胡润艺术榜通过品牌推广所产生的杠杆效应实现资金与理念的循环。上榜名单中的艺术家作为新富阶层的代表，其生活方式对公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而受众的认可程度为品牌创办者带来可观的广告收益。反过来，品牌的扩张

进一步提升了艺术榜的权威性。

非营利模式的艺术评选活动则大多以寻求赞助的方式实现资金流的平衡。1987至1989年，特纳奖由Drexel Burnham Lambert公司提供赞助。1990年，由于没有新的赞助人，大奖暂停颁发一年。1991年，“第四频道”成为特纳奖的新赞助人，奖金也由最初的1万英镑增加至2万英镑。雅昌艺术网主办的“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 (AAC)”评选活动，在主办方做出资金保障的前提下，2008年度的评选活动得到了梅塞德斯·奔驰和中国民生银行的赞助。

而在这之外的第三条途径，则是由获奖作品本身完成资金的循环。总部位于香港的Sovereign集团董事长霍华德·比顿 (Howard Bilton) 于2003年设立了“杰出亚洲艺术奖” (Sovereign Asian Arts Prize)，年度奖金为2.5万美元，旨在“对当代一些最重要的艺术家给予承认”。2005年，他为欧洲艺术家创立了另一奖项，奖金总数为2.5万欧元。与其他艺术评选模式不同的是，这两种奖项为买家提供了购买作品的新机会。候选作品的最终数量为30件，除1件获奖作品外，其他29件艺术品将进行拍卖，艺术家与主办者参与分成，另外有部分拍卖收入用作慈善目的。此种资金运作方式无疑令奖项评选过程与目的性更加微妙，却也成为艺术与市场新的契机。

幕后推手：无形的力量

艺术评选活动既非主题鲜明的展览策划，又不直接与市场发生关系，然而它在推动艺术发展方面却扮演了重要角色。评选活动中，同一时期的不同艺术风貌被摆在一个共同的平面上相互对话，此种过程将在纵向的艺术史中显现出清晰的脉络。以特纳奖为例，自设立起，其评判标准就挑战着公众的承受力与判断力。比如1998年黑人艺术家克里斯·奥菲里用大象粪便画成的黑色的圣母玛利亚，1999年“坏女孩”崔西·艾敏那张扔满酒瓶、安全套、染满污迹的床，以及2007年艺术家马克·沃林格富有争议的反战作品《国家机器——英国》。当然，获奖艺术家们的名字也因其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张力与历史深度进入了当代艺术史。大家耳熟能详的吉尔伯特和乔治 (Gilbert and George)、斯蒂夫·麦奎因 (Steve McQueen)、达米安·赫斯特 (Damien Hirst) 皆属榜上有名。除了特纳奖之外，仅在英国，就有超过一打的重要奖项，包括约翰·莫尔斯奖 (John Moores Prize)、BP肖像画奖 (BP Portrait Award) 及哲尔伍德绘画奖 (Jerwood Prizes) 等，每年还会有新的奖项推出。不同奖项所执行的特有准则为艺术机制的发展提供了不同依据，而奖项评委的预

见性也将历史演变中得到考验与证实。

如本届“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评委会轮值主席高名璐所说的，“学术和责任是当代艺术的核心品质”，在200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艺术界以其实际行动彰显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责任感，以“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为评选主题的“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评选充分展示了艺术界在社会活动中的角色担当。“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评选分为媒体奖项、学术奖项、特别奖项三部分，全部奖项均从评选专题出发评定。对社会现实和人性高度关注的刘小东以其在创作中对生活于底层社会的弱势群体和平凡人的深度表现，荣膺“2008艺术中国年度艺术家全场大奖”。AAC艺术中国以其对艺术与当代社会现实之间互动关系的准确把握成为当代艺术的展示交流平台，并为其注入发展推动力。

核心价值：凝聚与发散

过去两届“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评选中的积累和沉淀为本届的评选工作注入了更深层次的学术内涵，第三届AAC艺术中国秉持“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的评选主题，全面评估2008整个艺术界。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喧嚣热闹的艺术市场陷入低迷，被高涨的市场行情边缘和遮蔽了的艺术批评重新成为支持和推动当代艺术发展的直接动力和幕后推手。面对金融危机如何调整，是这个艺术界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评选成为在此大背景下对话交流的最佳平台。

依托艺术，回馈艺术，促进中国当代艺术良性发展是AAC艺术中国评选活动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在当代艺术发展中扮演各自角色的艺术家、批评家、公共艺术机构、一二级艺术市场在此宽阔平台上实现良性对话和互动，而这一点也正是横跨艺术界的艺术评选活动的文化担当。透过众多艺术评选活动的纷繁表象，真正具有社会责任感、推动艺术发展，为完善艺术发展机制做出贡献和提供思考空间的艺术评选为执牛耳者。